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伟人传记

邓小平



中央文献出版社



伟人传记

——邓小平

◎ 主编：邓朝晖

(第三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第四篇

邓小平的治乱方策

邓小平三落三起,历经各种文攻武斗,堪称斗争勇士。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文革”中,倒下了多少将帅英豪,独有他,战险滩,斗恶浪。在国家有难、民族遭劫的危急关头,邓小平义无反顾,挺身而出,拨乱反正,拯国家于将濒,扶大厦之将倾,引领社会主义航船,沿着现代化建设的航向乘风破浪,扬帆万里。



一、“打不倒的东方矮个子”

邓小平的传奇生涯中最引人入胜的情节是他在政治舞台上三蹶三起：

第一次，20世纪30年代在中央苏区，邓同毛泽东一起受到“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排挤，被打成江西罗明路线的头子，勒令检讨，撤职下放，劳动锻炼。直到毛泽东路线取胜，邓才彻底抬起头来。第二次，20世纪60年代，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中，邓从总书记一下子栽成“二号走资派”，被林彪赶到江西的一个“牛棚”中，一困就是三年多。林彪垮台后不久，邓又从“文革”的焦土中站了起来。



台湾《中国时报》大陆新闻部资料室

第三次，20世纪70年代中期，邓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不到一年，再次中箭落马，成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这一次，许多人都认为他彻底完了。可是粉碎“四人帮”后，“邓选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计谋策略，去搏斗、斗争、交谈、说服和激烈的争论，他再次掌了权”。

擅长人物传记的索尔兹伯里对邓的三蹶三起感慨万

端，他说：“邓小平的东山再起，其离奇变幻，即使通查中国的古籍也找不出第二件。”还可以补一句：在世界史书上也难找出第二例。

宦海沉浮本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没有谁像邓这样大起大落，一生经历三次。更令人惊叹的是，邓的三起三落不是简单的循环。他像个富有魔力的皮球，每下落一次都反弹到更高的位置上。这其中是否有什么奥秘？

身处逆境而达观自信，恐怕是第一条。毛毛说：“我父亲为人性格内向，沉稳寡言，50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遇事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在逆境中，他善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并用一些实际的工作来调节生活，从不感到空虚和惶惶。”邓是不会杞人忧天的，因为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呢。这是他战胜厄运，走出低谷的第一素质。没有这一条，不用别人踏上一只脚，自己就会意志崩溃，不要说三蹶三起，一蹶就会不振。



第四篇 邓小平的治乱方策

伟
人
传
记

乐观不等于认命，而是为了耐心等待有朝一日东山再起的机会。政治风云的多变性既为得志者预备了失足的陷阱，也会为失意者提供重振旗鼓的机运。区别只在于逆境中人无法为自己创造机会，只有静观其变，耐心等待时来运转。等待也有可能像屈大夫那样等到最后仍不见楚王回心转意，彻底失望。邓比较幸运，他先后等来了王明路线被清算，林彪垮台，“四人帮”被抓。这三件事是他先后三次走出低谷的重要转机。

机会对于失意中人总是比较吝啬的，因此除等待之外，还要加一点主观能动性；保持头脑敏捷、信息灵通，认真捕捉机会。邓每次被“打倒”以后，都对时事政治保持浓厚的兴趣，留心报纸和新闻广播，千方百计与外界保持联系。当他得知林彪垮台、“四人帮”被擒，他认为时机到了，立即作出相应的反应，主动给毛泽东写信，给华国锋写信，一封不行，再写第二封。如果没有这种主动性，他会不会被人们遗忘很难说。

大丈夫能屈能伸。人在下坡走，必须学会必要的妥协，给当权者以某种满足。邓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所谓“不肯改悔”即来于此。但是当环境需要他作出妥协时，他能够识时务。第二次复出前，邓曾非常谦虚地向毛泽东检查了自己的缺点，使毛泽东相信他与刘少奇有区别，可以重新委以重任。第三次复出前，他也向新的党中央承认自己在1975年的工作中难免有不足和错误，表示真诚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评和教导。这些都是明智之举。人在劣势之中是不能过分较真的，有理无理要等一阵子再说。

谚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有不测风云，所以在政治上，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一帆风顺。问题在于翻船以后能否摆脱厄运，东山再起。在这方面，关键取决于人谋。古往今来，有许多“成功之道”，研究怎样从失败走向成功。但没有什么“失败之道”，研究如何从成功走向失败，似乎失败全在天意，没有人希望失败，也没有人琢磨失败中的通道。事实上，成与败，起与落，有一定的因果联系。个人无法避免失败和挫折，但是可以选择失败和挫折的方式。有的人一生不起波折，但他只能平平而过，没有大的作为。有的人一跤跌下去就永远爬不起来，甚至越跌越深。邓是少有的反例，他不仅三落三起，而且越跌越高。他有什么特殊的政治技巧？除了上述各条，他拥有过人的谋略智慧，助他战胜厄运，走出低谷。还有一个先决条件，即他每一次下落，都不是个人患得患失所致，而是因为他坚持了真理，不愿向错误屈服的结果。这样的下落，成为他重新崛起的根据。没有这一条，在逆境中无法乐观自信，耐心等待也难有出头之日，必要的妥协只能使他越跌越惨。

巴拉奇·代内什将周恩来和邓小平的作风作了一番比较：“周恩来注意策略，使自己能够停留在水面上，但不能改变激流的主要方向。邓小平却



二、中央苏区的“毛派头子”

不顺从这股激流，而是马上筑坝拦住洪水。开始是成功的，但后来仍被激流冲走。他要得到周恩来利用自己的策略未能获得的东西，需要五年时间，有时甚至更长。周恩来从不怀疑毛泽东的教导，邓小平却敢于用毛泽东的教导反对毛泽东的行动。”

像邓这样的人，有个性，容易跌跟斗，受挫折，但由于真理在手，大道在行，一时受阻就如激流暂时被碎石挡住了，只会积蓄起更大的冲力。一旦时机成熟，他会很快地蹦起来，而且会蹦到更高的位置上。每下跌一次都为他积累了更大的优势，成为他走向顶点的阶梯。文革中为什么毛泽东允许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20世纪30年代邓曾经作为毛派正确路线的推行者被打倒过一次。粉碎“四人帮”后为什么邓小平能够重掌大权？主要是因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邓作了义务宣传，使邓的支持率大大上升。爱洛特曾问一位中国官员，他们为什么如此尊重邓小平这位上上下下那么多次的人？那位官员回答说：“这正是我们信任他的原因。”如果邓的几上几下，不是为了坚持某种给人民希望的东西，而纯粹是个人的身世沉浮，能有多少人信任他呢？

二、中央苏区的“毛派头子”

1931年秋，27岁的邓小平由上海来到江西，投奔毛泽东，在赣南闽西红色根据地做革命工作。党指派给他的第一项任务是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上任不久，原设在上海的党中央也陆续进入苏区。瑞金遂成为“红色首都”——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和中共临时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邓作为中层干部，不得不把位子让给上海来的同志。1932年5月，邓离开“红都”到南边的会昌担任中心县委书记，掌管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工作。这三个县位于“红区”和“白区”的交界，是中央苏区的南大门，战略地位堪称重要，但“赤化”的程度远不及中心地区。每县只有一个独立营，赤卫队的枪支也很少，商店大都关了门，财政经济十分困难。邓不得不从头开始，按照毛泽东的办法，惨淡经营，不久也就有了政绩。毛泽东来会昌检查工作，赋诗称“风景这边独好”。

中心苏区那边的风景怎么样呢？王明一伙“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进驻苏区后，加强了他们对根据地的直接领导。他们奉行一条从莫斯科进口的“进攻路线”，要求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向着中心城市发展”。毛泽东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务实主张被斥之为右倾保守、逃跑退却路线。毛泽东保护中农，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的温和政策被斥之为“富农路线”。毛泽东本人因为“不尊重中央领导”而失去在红军中的职务，只剩下苏维埃主席一个空头衔，毫无发言权。



上层领导内部的这场路线斗争很快波及到邓所在的边缘地区。临时中央的“毛头小伙子”虽然有共产国际撑腰，但要把毛泽东这位土生土长的领袖连根拔掉仍很吃力。他们架空了毛的权力后，又打算公开批评毛的观点。可莫斯科方面不同意，担心这样做会导致分裂。但是不清除毛泽东在根据地党和红军中的影响力，他们怎么发号施令呢？于是他们采取敲山震虎的办法，把斗争的火力对准毛泽东的追随者们，而对毛泽东本人“不予深究”。

临时中央的领导人很快从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身上发现了毛泽东路线的影子。罗明在一份工作意见书中对“左”的扩红计划提出异议，他说：扩大主力红军应从实际出发，区别边沿的游击区和牢固的中心区，不能平均摊派任务。在上杭、永定、龙岩等边沿地区应着重组织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分期分批地发展主力红军，而不能硬调硬编。在目前情况下，要在杭、永、岩敌后或接近敌后区扩大主力红军，莫说我无办法，就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请来斯大林同志，或请列宁复活，一起来这里，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它地方对群众大演说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看也不能解决问题。“左”倾的领导将这些意见概括成反国际的“罗明路线”。

“罗明路线”幽灵般地回荡在中央苏区上空。临时中央很快又发现在江西的会、寻、安也有一条同福建杭、永、岩的罗明路线没有什么区别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于是邓小平被划进了毛泽东的圈子。不久，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也圈了进来。这样便构成一条“江西的罗明路线”。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人都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而邓是四人中的头子。

谁都知道“罗明路线”实即毛泽东路线。王明等人心想只要把邓小平和罗明等人在政治上置于死地，就可以完全缚住“巨人”毛泽东了。这回，天塌下来不是由高个子顶着，而是掉到矮个子身上了。“‘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60年后邓还发出这样的感叹。

对邓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接踵而来。他先是受到公开点名批判，并撤销会昌中心县委书记职务，调到江西省委作检查反省。幸好在这里他碰上三位在巴黎时的老同学：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省军区司令员陈毅和省委组织部长蔡畅。留法派与留苏派不同，他们可不认为当年的“小钢炮”犯了什么弥天大罪。于是邓在失去中心县委书记后，又悄悄当上了省委宣传部长。按当时的级别，他只是同级调动，没有降职处分。

这下更触怒了王明的临时中央。于是斗争向纵深发展，“会、寻、安的罗明路线”扩大成邓、毛、谢、古为代表的整个“江西罗明路线”，受到猛烈的批判围剿。在批斗会上，邓、毛、谢、古据理申辩，又被说成“公开



在会场上进行反党活动”，罪加一等，成为“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当众缴了他们的枪。最后，四个人同时被撤职。邓失去了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最后还受到严重警告的处分。

受到撤职警告处分的邓小平还必须对自己的“错误”作出自我批评。他不得不违心地批评自己对“进攻路线”的意义估计不足，想以此过关。但他的对手对这简短的自我批评十分不满，于是把他发配到苏区前线的乐安县南村区去当一名巡视员。

邓小平在政治上被党一脚踢开了，随之家庭生活也发生变故。他任瑞金县委书记时才结婚的妻子很快离他而去，嫁给了带头整邓的中央组织部长。

南村人从未听说区委里有个巡视员的职务，那么邓小平来此干什么呢？人们疑惑不解，熟悉他的人仍以首长相称。邓一点也不感到窘迫，沮丧。“首长身体可好？”“啥子首长啰，同志们好。”他索性把问题挑明：“中央及省委都开过会，把我打成了罗明路线的江西代表和执行者。在会上我两次据理申辩自己的观点，不管他们怎样残酷斗争，我坚决执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正确的就要坚持。”坚持正确路线为什么丢了官？邓回答说：“革命哪能一帆风顺呢？”人们这才明白为什么他受了沉重打击还如此坦然。

在南村巡视不到十天，临时中央又令邓卷起铺盖回到江西省委所在地宁都。据说这是因为乐安的南村是边区，怕出问题。出什么问题，整他的人当然不会担心邓的个人安危。那么只有两种可能：怕邓携带党的机密投敌而去；或者天高皇帝远，怕邓在这里煽动谋反。

信任程度如此之低，回宁都自然不会有好日子过。左倾领导要他接受更严峻的考验：到宁都附近的一个光秃秃的山岗上开荒去。挥锄开荒邓不在乎，早在巴黎的雷诺工厂他就炼就了一幅硬身板。但人是铁，饭是钢，吃不饱肚子差点要了他的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邓默默地挖山不止。

好心的蔡大姐得知邓忍饥挨饿，还要抡着大锄头，马上叫人去买回两斤猪肉两把大蒜和一些辣子、水酒，烧了三个菜，煮了一锅饭，准备请邓回来饱餐一顿。邓几个月没尝肉味，没闻酒香，听说有好吃的，喜不自禁。但他怕连累老同学，来的时候把草帽压得低低的，几乎遮住了眼睛。这位“劳改犯”趁午休无人的机会，悄悄地从省委后门溜进蔡家，着实美餐了一顿。临走时大姐还让他带回一些酒菜，嘱咐他要保重身体，再坚持一下。因为李富春到瑞金汇报工作去了，到时会同有关领导反映邓的情况，为他讨回公道。

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也属留苏派，但他比较注重实



第四篇 邓小平的治乱方策

伟
人
传
记

际，尤其爱惜人才。当他从李富春那里得知邓小平的处境，连叫“临时中央不用邓小平，真是偏见”。“埋没人才！”目前正值大军压境，怎么能让邓小平这样的人才去开荒呢？为了拯救这个人才，王稼祥想出一个办法，他以总政秘书长杨尚昆上了前线，守边境无人作为由，要求把邓小平调上来当代理秘书长。经王稼祥多方努力，邓才结束劳改生活，重返赤都瑞金。

来到总政机关，邓头上那顶“右倾”帽子并没有动。邓不在乎，他好好珍惜王稼祥给他的这次机会，把个《红星报》办得红红火火，还约请毛泽东写过一篇文章。由于有《红星报》主编的担子，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邓才得以随军长征。试想一下，如果邓当时被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敌后，他的人生道路会怎样呢？同邓一起被打倒的毛泽覃和古柏都是留守人员，大军西去不久，这两条年轻的生命都葬身在南方的青山绿林中。

长征的开始意味着王明路线的失败。毛泽东开始有了发言权，在他的影响下，1935年1月，邓当上了中央秘书长。党史资料中没有为邓正式平反的记录，但是当他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遵义会议时，邓的“右倾”、“反党”帽子无疑是取消了，而且不仅仅是取消了。第一轮劫难从落到起，整整经历了三年。邓回忆说，遵义会议时他和毛泽东住在一起。这两位决定中国命运的人物，终于在历史上相遇了。

中国古代哲人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20世纪30年代在中央苏区挨整对邓来说是“祸”，不是“福”。但是，40年后，这个“祸”变成了“福”。1972年8月4日，毛泽东在决定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批示中写道：“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的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还有（二）（三）（四）。毛泽东决定重新起用邓小平，除了“人才难得”等等，“毛派的头子”无疑是个关键性因素。

当然，这是邓始料未及的。历史证明了邓的政治逻辑：坚持真理，对自己对革命都有好处。

三、同高、饶反党联盟的不屈斗争

《邓小平传》的作者乌利·弗兰茨认为：“邓的党内政治生涯完全取决于高饶问题的解决。”

邓本人也承认，高饶事件他知道得很清楚。建国后，他们三人几乎是同时调进中央来的。此前，高岗在东北局，饶漱石在华东局，邓在西南局，分领一方党政要务。表面上看，高岗的职位和邓一样，都是一个地方局的第一书记。实际上高的地位更重要，因为高所在的东北从三个方面看对全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这里集中全国的主要工业，是朝鲜战争的后方，又



是通往苏联的桥梁。高本人是斯大林多年的密友，在东三省权倾一方，人称东北的“太上皇”。1949年9月，高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10月1日，高在他自己的堡垒检阅游行队伍时，人群中高呼“高岗万岁”，却不呼“毛主席万岁！”不久，高被调到北京，任命他做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惯于表现自己、独一无二的高岗，根本不知道党中央的这种“提升”是把他同他的权力基地隔开，进北京后，权力欲进一步膨胀，想取代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位置，当党的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他在党内散布“军党论”，将中共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断言“党是军队创造的”，并把他自己划入



1952年，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

“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认为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现在是掌握在“白区的党”，即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手里，因此必须改组中央。为了达到扳倒刘、周的目的，高还进行了大量“非组织”活动。他首先取得了饶漱石的配合。据邓说，高还得到了中南局林彪的支持。对西南方面，高用拉拢的办法，找邓小平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想争取邓同他联手扳倒刘少奇。邓保持警觉、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还找陈云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邓觉得问题严重，立即把高岗的阴谋诡计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

毛泽东听完反映后，反问邓：“山雨未来，风先满楼，你看风向来自何方呢？”

邓当然是支持刘和周的，但是他想了想，作了个更巧妙的回答：“在其位谋其政，应本份事；不在其位而欲谋其政，这是权力欲作怪呵！”

“权力欲”是个很敏感的问题，邓一语点中要害，触动了毛泽东最敏感的神经。毛听后，想了想，恍然大悟：如果容忍党内这种“不在其位而欲谋其政”的权力欲存在，那将永无宁日。

很快，在毛泽东心目中形成两个司令部的概念。毛在1953年12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



第四篇 邓小平的治乱方策

伟
人
传
记

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



刘少奇签署《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

1954年2月召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毛没有参加，会议由刘少奇主持，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在这次全会上，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会后，邓小平负责组织中央书记处分别就高饶的问题召开座谈会，继续揭发和对证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高岗拒绝教育，在一次会上当场拔枪自杀。

1954年4月，邓小平在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接管了饶漱石中央组织部长的职务。一年后，邓跨进了由17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的大门，同时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的还有林彪（这一点与林彪支持高岗的说法似有矛盾）。又一年后，在党的“八大”上，邓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政治局6常委之一。常委会作出决定，书记处负责执行，邓领导这个重要机构一直到1966年。

党内路线斗争犹如惊涛骇浪，每一次都有人沉有人浮。20世纪50年代这样的党内斗争发生过两次。邓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这次斗争中连升三级，进入最高权力中心。这次成功主要因为他光明正大，从不搞阴谋诡计，不搞几个人的小圈子，所以高岗的那一套在他面前没有市场。20世纪80年代在作历史决议时，邓还是认为反对高饶的斗争没有错。而另一次，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反对彭德怀则错了。庐山会议在当时的气氛下，与会者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放弃原则甚至不惜人格，违心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用各种攻击性语言去揭发、批判、诅咒彭德怀的反党行为；要么像张闻天那样，坚持真理，仗义执言，成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之一。邓有幸避免了

四、明智的自我批评可以保护自己



这两种可悲的命运，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会前他打乒乓球不小心扭伤了脚未能上得山去。天助他矣！

四、明智的自我批评可以保护自己

1969年10月20日，中国“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被林彪以战略疏散的名义发配到江西南昌市郊一个偏僻的角落，从此开始了他三年零四个月的“牛棚”生活。这是他第二次被打倒。

三年零四个月对一位65岁的老人来说是够长的，更何况他当初并不知道自己重获解放的确切时日。从15岁旅法求学算起，整整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动了半个世纪。如今远离政治中心，谪居江南一隅，他该如何打发这段没有“刑期”的流放生活呢？

据他的小女毛毛（邓榕）说：“在江西的这一段时间里，父亲有一个习惯，每天黄昏落日之前，总是十分规律地围着我们那个小小的院子散步。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走着。……我时常看着父亲，看着他永远那样认真、永远那样沉静的神情，看着他向前迈出的快速而稳健的步伐。我想，就在这一步一步之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随着前进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确，更加坚定起来”。毛毛还反映她父亲用劳动和读书来充实生活，从不感到空虚与■徨，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在自己的园子里养鸡种菜，晚上读书看报，冬天还坚持每天用冷水擦身。看来，邓小平并没有因为被打倒在地而心灰意冷、自甘消沉。

毛毛说的信念是个重要因素。有了信念后，关键是等待，等待适当的时机。而时机总是会有的，因为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条辩证法的规律对任何人都起作用。时机终于等到了。

这一大快人心的消息50天后便传到邓小平耳朵里。“父亲显得兴奋和激动”，毛毛说，“他只说了一句话：‘林彪不死，天理不容！’”

其实邓小平此时内心的活动远非一句话可以表达的。他在党内历次“路线斗争”中始终站在毛泽东一边。只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发觉邓小平和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竟然不听他的话，背着他搞什么“白猫黑猫”，“物质刺



邓小平、邓颖超等在中共十大主席台上



第四篇 邓小平的治乱方策

激”，根本不提“阶级斗争”这个纲，而且到了他无法左右局势的地步。于是毛泽东依靠林彪等人发动“文化大革命”，把他心目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打了下去。林彪表面很听毛泽东的话，他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把毛泽东捧得比马克思、列宁还高。而真正对毛泽东心怀不轨的正是这个口口无限忠干的“亲密战友”。林彪死后，毛泽东身边真正能够治国安邦的只有周恩来一人可以依靠。周恩来是“文革”中唯一没有打倒的党政元老，他要挑起治理“文革”乱摊子的重担，又该依靠谁呢？邓小平心里有数。他觉得林彪的死对他的政治命运来说，是个难得的转机，他不能轻易放弃这个机会。

于是，当天下午，邓小平就挥笔向毛泽东写了一封四千余言的长信：

第一，他向毛揭露了他所知道的林彪、陈伯达的反革命罪行。

第二，他非常谦虚地向毛检查了自己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第三，他向毛表达了自己想为祖国为人民继续工作的强烈愿望。

揭露林彪不仅仅出于义愤，也是一种政治表态，中共党内每次大的斗争都需要用这个办法来划清界线。

为什么还要作自我批评呢？林彪再坏也不能证明自己没有缺点错误。打倒刘邓毕竟是毛同意的，即使完全打错了，也要给党的主席留个转弯的余地。况且邓小平预计到毛不会因为林彪事件而将刘邓的问题一风吹，因为毛泽东对路线问题从来是不放过的。毛泽东从不允许任何人反对他的路线，这是事实。但是他也不主张把犯错误的同志一棍子打死。打是要打的，但打了几棍子后，只要你承认错误愿意改正，他又会很宽容地把你招到身边。在毛泽东身边，犯了错误不要紧，关键是要承认自己错了。所以不管自己到底有错没错，虚心地检讨一下是绝对必须的。

在谈到自己的工作时，邓言辞委婉恳切：他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了，他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68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他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求能为党为人民做一些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而且这仅仅是个要求，到底行与不行，他静候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

邓小平的信很快转到毛泽东的手上。看到老朋友熟悉的字迹，几十年的风雨烟尘出现在眼前，毛泽东果然触动不小。林彪垮台后，他已经把所谓压制文革的“二月逆流”说成是老师们因不满林彪而想发发牢骚，并且特别提到那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发表的，意即不像林彪那样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他感到和老师们距离接近了：“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去世，毛泽东感叹万千，非常破例地穿着睡袍抱病参加陈的追悼会。追悼会上，毛讲了许多陈的好话，仿佛他现在才发现陈毅是个好人。其实陈毅反对过他多次。不过，陈



四、明智的自我批评可以保护自己

伟
人
传
记

所谓“反对毛主席”有个特点，即都是公开的，不像林彪搞阴谋诡计。陈的坦率直言与林的两面三刀在毛面前形成鲜明对照。这种对照自然会延伸到邓小平身上，因为邓和陈一样，也是有名的直性子。

这些微妙的变化没有逃过周恩来的眼睛。林彪垮台后，毛泽东身边只剩下周和中央文革两派势力，而江青等人只会空喊革命，治国搞建设一窍不通。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只有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担子交给周恩来。周首先建议毛泽东撤销军委办事组，由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把军权悄悄收了拢来。剩下党政两摊子，周迫切需要像邓小平那样有魄力的人才来协助。因此，周恩来时刻等待机会召小平出山。现在看来关系缓解了。但是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即毛自己怎么转弯。刘与邓是毛同意打倒的，毛不可能说他做错了。因此，要重新启用邓小平，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把刘与邓区分开来。周知道这还需要一段时间。

同邓小平一起在江西“接受改造”的王震已于邓先期回京。当他听说毛泽东在陈毅的追悼会上谈到了邓小平，有了转弯的预兆，便利用一次汇报工作的机会，向毛详细介绍了邓小平在江西劳动的情况，极力建议毛泽东尽快启用邓小平。王震摸到毛泽东的底儿后，立即派人找到回京的邓榕，要她回江西后转告她的爸爸，毛泽东已经想好了如何把刘与邓区别开来的办法。

身在江西的邓小平得到这个消息后，又不失时机地向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进一步检查自己的错误，要求重新效力，表示一切听从党的安排。“邓小平过去的经历和他明智的自我批评为他重返政坛赢得了毛泽东的赞同”。毛泽东看到这封信，稍加沉思作出如下批示：

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毛泽东

七二年八月十四日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意在说明刘少奇是敌我矛盾，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团结的对象。毛泽东的政治艺术是要做到既维护打倒刘少奇错误路线一案不变，以表明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仍然是必要的，同时又显示自己宽广的胸怀，表示他愿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即使像邓小平这样犯



第四篇 邓小平的治乱方策

伟
人
传
记

过“严重路线错误”的人，只要愿意改正，党也是欢迎的。同时，有刘少奇“错误路线”在案，以后的邓小平也好使用些。其实，就刘少奇的真实情况来说，毛泽东的这三条同样也适合于刘。但是即使毛泽东当时知道所谓刘少奇的“叛徒、特务、内奸、工贼”问题是冤枉的，毛泽东也不会这么做。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他就等于自我推翻了他的文革主张。从这点说，邓小平非常有幸。他之所以有“改过自新”的机会，多亏他前面还有个一号走资派，起着代表“第九次错误路线”的作用。不然的话，邓小平即使有30条成绩，也难过得毛泽东这一关。

不管怎么说，有了毛泽东的批示，周恩来就好办了。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和指示，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启用邓小平的问题。政治局里的文革派，即后来的“四人帮”，非常害怕邓小平复出。他们对付一个周恩来已属不易，再来一个邓小平就更加不利，而且他们知道邓小平是更难以对付的。但是，由于周恩来手上握着毛泽东的尚方宝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只好暂时退后一步，同意邓小平复出。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五个月后，邓进入中央委员会。邓迈出了复出的第一步，这一步非常艰难，但不是决定性的。

五、肩挑三副重担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他的大书房里召集了一次对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很有意义的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宣布了一个重大决定：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紧接着毛泽东建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齐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是靠这首歌带出一支军队和一个政党的，林彪事件后他不止一次号召他的下属齐唱这首歌。看得出他很希望把全党全军的步调重新统一起来，解决好林彪死后留下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的现象。毛泽东早在这年年初就提出这个问题。现在再次重申，表明他觉得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怎么解决呢？毛泽东把视线移向坐在一旁的邓小平，“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毛像介绍特别来宾似的说，“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接着，对邓进行公开评价：“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希望邓把“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毛泽东当众建议，邓小平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还准备给邓配个政治局秘书长。邓不要这个头衔，毛就让他当军队的总参谋长。毛心想，有邓小平的果断和魄力，不议政、不议军的问题就不难解决。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器重，主要因为邓人才难得，办事果断。现在，他



就需要这样的人才，以便填补周恩来以后的权力真空。这种发展趋势引起“四人帮”极大的恐慌。首先出面反对重用邓小平的是江青。1974年3月，政治局讨论派谁去参加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毛泽东记得20世纪60年代邓小平在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较量的劲头，便提议邓去。江青害怕邓小平在国际舞台上再次提高威望，极力加以反对，毛泽东没有偏袒他的夫人，反而严厉警告江青不要反对他的意见。邓复出后与“四人帮”的第一次较量，由于毛的支持而取得胜利。

“四人帮”排挤邓小平，是因为邓和周恩来联在一起。周到1974年身体越来越糟。如果邓一步步上升，将来周的接班人就非他莫属了。这是“四人帮”最不愿看到的结果。他们几人都知道邓比周硬，因而更难对付，因此必须趁他羽翼未丰时加紧打击。1974年7月，毛主持又一次政治局会议。“四人帮”趁周不在场，由江青带头，其他三人配合，从不同方面向周恩来发起攻击，想通过攻周达到排邓的目的。毛泽东大为恼火，警告他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要江青不要设两个工厂，即不要乱打棍子（设钢铁工厂），乱扣帽子（设帽子工厂）。江青等人不自量力，把看家本领用到周恩来身上，结果更引起毛泽东的反感。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上海帮”和“四人小宗派”的概念，使江青等人在以后的较量中更加被动。

毛泽东的性格是他认准了的事，别人越反对他越坚决。“四人帮”攻周排邓是冲着周以后国务院总理的位子而来的。毛反其道而行之，于1974年10月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为周以后的总理人选预作了安排。这下“四人帮”更慌了手脚。四届人大召开在即，如果人大后形成一个周、邓体制，他们的梦想就全部落空。无论如何，他们要阻止这一局面出现。这一次，他们经过预谋，决定拿“风庆轮问题”对邓搞一场突然袭击。10月17日，邓主持政治局会议，江青首先发难，提出所谓风庆轮事件上的崇洋卖国问题，并且逼问邓小平：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看法？邓面临两难选择：他不会同意江青的说法，但是如果起而反驳势必爆发一场无谓的主义之争，争论中很可能被他们抓住什么辫子，因为这帮人抓辫子很内行。于是邓作了第三种回答：我要调查。江青等人不依不饶，大吵大闹。邓气极：政治局讨论问题要平等么，你们不能用这种态度待人。“四人帮”一拥而上：早就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你果然跳出来了。邓忍无可忍，以更干脆的方式回答了“四人帮”的挑衅，他起身离席，拂袖而去。毛泽东后来称赞邓这一次不向“四人帮”让步，做得好。

“四人帮”这次突然袭击，不仅没有捡到便宜，反而有可能要负搅乱政治局会议的责任。因此，他们更加紧张起来。为了争取主动，他们决定恶人先告状，兵分两路去争取毛泽东的支持。一路由毛泽东亲手提拔的接班人王洪文出面，到长沙面见毛泽东，从正面告周恩来等人的状。另一路江